

=====

文革博物馆通讯（九〇八）·华夏文摘增刊第一〇七六期（zk1704d）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八日出版）

本期目录

| | | |
|--------|---------------------------|-----|
| 【前事不忘】 | 文革五十年，一个八零后的反思 | 封楚宁 |
| 【人物春秋】 | 八月二十四，老舍的最后一天如此漫长 | 李 辉 |
| 【拒绝遗忘】 | 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回忆录（选载之十一） | 王复兴 |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前事不忘】

文革五十年，一个八零后的反思

• 封楚宁 •

对悲剧的遗忘几近人类历史之常态。亲历者往往或回避，或难以超然于自身悲愤理性思考，后来人则难有深究的动力与耐心。相较于个人人生，人类社会所历苦难可谓无边，为了心态健康，实不可苛求常人沉浸于往昔的罪恶与悲痛中。不论曾多么天崩地裂，悲剧总会随时间流逝褪色为一个抽象符号；只是凭借在心中对这些抽象符号赋予价值、加以排列，人们才有望形成关于历史的些许洞见。能有意识避免重蹈覆辙已经很好，而若能析出更高明的智慧，避免一系列可能错误，大概即可谓文明之进步。只可惜，古今中外，后一情况尤少，无怪乎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大家托克维尔有此名言：“历史是一座画廊，原作很少，复制品很多。”

托克维尔非法国大革命亲历者，他生于大革命后的十年间，当其著书挖掘大革命成因时已年近五旬。在他身后，革命魔力有增无减，革命恐怖不断重现；近两个世纪后发生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无论其手段之丰富还是过程之复杂，都堪称二十世纪革命登峰造极之作。公平地讲，作为一个时代，文革中的中国不乏一些事业的发展进步，进入1970年代做出的某些整顿和外交破局甚至可谓改革开放的先声；但作为一场革命性政治运动，文革对社会的撕裂和对人性的摧残，怕只有受其启发的红色高棉可与争锋。

社会性悲剧，无论战争、动乱还是政治清洗，都非纯粹的卑鄙或疯癫可解释。简单的利己者易成贪官，却极难成为蛊惑亿万人的魔力领袖。广泛的社会动员，理想主义和利他主义情怀必不可少，往往依托意识形态，虚伪和真诚混杂难辨；而文革的革命理想主义，在我看来具有浓厚的青春依恋气息。

发生在共和国即将年满十八之时的文革，展现出热血青年的常见通病：

理想远大，见识短浅，眼高手低，反叛，暴力。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火种，由世纪初同盟会时代、五四时代和北伐时代的有志青年传递给了怀抱共产主义理想的青年们；每一轮革

命热潮都强调平等，而诡异的是，最终以百万青年的鲜血奠基的共和国，却创造了一个在中国史无前例的种姓社会：每一人，按其社会地位所具有的理论剥削性和与新政权的敌我亲疏关系，被贴上永久的成分标签，子孙世袭，难以变通。共和国成年前的十七年里，一轮轮政治运动，让这个种姓体系愈发庞杂，不但经济上的（虽然仅仅是历史上的）“剥削者”如地主、资本家被打入另册，就是思想上不能完全顺服者也成了“人民”的敌人。同时，十七年里整个国家从工作到消费，从娱乐到婚育，所有人所有层面的生活都被纳入了国家控制的网络，无路可逃，无处可藏。在这样矛盾大量累积的十七年后，在大城市具有不同地位的红卫兵帮派斗争和“血统论”引发的争论打开了人民革命的潘多拉魔盒，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暴露出各种私人恩怨、个人隐私和之前藏于百姓视线之外的特权和权术，各路造反派、保皇派、军队、公检法相互之间骇人听闻的武斗与镇反形成文革大乱的最高音，怕也是偶然中之必然。

但另一方面，起码在文革初期，无论领导者还是广大响应者，恐怕相当比例都怀抱着消灭剥削、实现人人平等的真诚理想。文革若仅是毛利用天下大乱打倒某些中央和省级领导干部，他何必坚持到去世、并将其和建国并列为一生所为两件大事？我宁愿相信，毛发动文革，或多或少出于一个气魄非凡又无法无天的终身革命者的真诚理想，又夹杂着他对青春的眷恋。为实现人人平等追随共产主义革命是毛泽东青春时代的选择，以“不断革命”论发动文革则是他试图圆满青春理想的大手笔；他在文革发动之初畅游长江，更是试图以青年般的生命力，烙下一个关于政权青春不朽的宣言。

毛泽东视野宏大，满怀理想之豪情。他对同僚和百姓个体生命与权利的漠视，并不妨碍他对制度性剥削和压迫的真心仇恨。他的“斗私批修”和“反对资本主义法权”，在文革后曾被普遍认为荒唐，近年来随着“走资派”被坐实，却又得到了很多人的共鸣；他对政治组织的兴衰规律确有洞见。毛泽东与其当日支持者的根本错误，乃是不能量力而为，妄求以卵击石。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驱力，绝非阶级斗争这等历史副产品，而是人的思考和交流，是文化的促进传承，是人类对自身可控自由的拓展。对现代社会源流不甚了了的他，或未意识到，自己以无多的晚年岁月，带领着光秃秃的智力资源，到底是在挑战谁？

毛泽东要实现的是人人平等，要反对的是资本主义。可他或不知晓，人人平等的理念和资本主义的社会机制，都萌发于一个“超级文革”——欧洲从西罗马帝国灭亡到民族国家崛起的千年中世纪。文革和中世纪，虽地域、年代与长度迥异，却有惊人相似：都开端于社会大动荡、信仰狂热和文化反智，都在中期出现秩序重建、文化复兴和受限的对外开放（中世纪后期欧洲和伊斯兰的商贸与学术交流，和中国1970年代的与西方接触、建交），都以精神权威坍塌、信仰改良、大规模对外开放（欧洲对外殖民时代开始，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商业化转向结局。二者最重要的区别，在于文革仅十载，而中世纪纵跨千年，几十代人；因此，文革可以被控制和策划，而中世纪欧洲的社会演进过程，无任何整体设计之可能；正是在这混沌中，自由、平等、民主、法制的理念浮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壮大，科学精神开始照亮人们认知和思考的空间，科技和商业共同提升的社会生产力让一个空前进步富足、保障人权的现代社会在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中世纪余波洗礼之后跃出水面。一个经过上千年无数试错得到的社会模式和价值体系，纵是存在种种弊病和缺憾，又怎能不继承仅打倒，就产生更好的替代品？

若说文革的革命动机尚有青春的理想主义色彩，文革的实现手段则大大利用了青春的愚昧和野蛮。个别和局部性的愚昧和野蛮或可归咎于一些偶然因素，全国性的愚昧和野蛮长期泛滥，则必有意识形态根源。

文革的发动，或许只是毛的政治策略；但其一点就爆成为十年动乱，毛泽东思想罪责难逃。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各路权威在毛死后依然通过选择性总结毛泽东思想为他文过饰非。把导致文革的毛泽东思想和所谓真实的毛泽东思想分开，是掩耳盗铃，是指鹿为马。无论是破四旧、抄家的红卫兵，武斗的造反派，还是抓五一六分子时的积极分子，他们的行为准则和是非观念，并非文革开始后才被灌输，而是在之前十几年里，在毛泽东思想润泽下，经“阶级教育”顺理成章形成的。造成文革的思想，就是正宗的毛泽东思想。

受到毛泽东的小农出身和青少年时代儒家教育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诞生于残酷的战争和党内外斗争中的毛泽东思想，对群体鼓动、组织颇有建树，对人性的认识却失之浅薄。毛的思想，主要是从哲学视角，基于道德化的宇宙观推出其认为合理或可欲的人的社会关系，虽标榜“实事求是”，却不包含以怀疑精神为前提、以理论与实践相互校验的实证精神为内涵的现代科学精神，这就给罔顾事实的宣传手腕铺了路。现实中，真相诚然往往并不好看，但唯有真相被不断探究、趋近，人民和政府才能做出有效应对，得到有效反馈。对真相的长期压制，纵可出于团结、稳定等高尚目的，却必然让决策者和百姓的判断和预期都日益偏离有效区间，行为失当，直至灾祸临头。因无人有能力确知一切事实，对真相解释权的垄断是最危险的一种腐败。因此，一个政权若想安邦治国，不应自己来钦定真理，而应维护人们自由评判真理的环境。所有钦定真理的政权，都实乃政教合一；其危险，就在于提供了意识形态化教条和皇帝新装般的谎言存活的土壤。

毛时代的闭关锁国，更让政治机器在压制真相、传播谎言的路上越走越远。这世界的悖论是，没有全球政府，国际政治是丛林政治；但也正因此，迄今未发生过全球性专制，任何利益都不能笼罩寰宇，总有各种“异端”生存处，有思想交锋的空间；因此若一国保持开放，其人民与政府的思想不太会脱离现实到危险地步。而在毛时代，对国民党渗透的恐惧、对西方世界的主动拒绝和与华沙阵营的交恶，让新中国自信、骄傲地走上了闭关锁国的路径；所谓“自力更生”的最主要后果便是当权者垄断真理解释权，让全民失去客观认识现实的能力，从而为反智主义、个人崇拜、仇恨文化的盛行和人性观念的丧失，创造了条件。

文革意图在铲除文化的基础上创造新文化，荒诞不堪，却被当时无数人视为金光大道。“知识越多越反动”这种口号，让很多国人以为反智是文革产物。其实，反智主义在农民子弟大批进入早先以知识分子为主的中国共产党后，尤其在知识分子的教条主义让革命行动严重受挫后，便成为党内军内一种文化基因：知识分子被怀疑和鄙视，老大粗受到信任和重用，学历高者有意虚报低学历。建国后，高层领导人认识到知识对于建设的重要性，一度对知识阶层采取了驯化赎买政策；然而在这场革文化命的革命中，从破四旧开始点燃的反智主义火焰，塑造了一个当代罕见的限制学习、打击思考、阻止知识传播的社会。文革的反智主义和中国历史上的焚书坑儒和文字狱尚有不同，中国皇帝的反智动机是维护家天下统治；文革反智主义则更像某些原教旨主义社会存在的以排他性世界观价值观净化社会的意识形态反智主义，这恐怕在中国前所未有。毛泽东思想就充当了这个排他性思想填充物。

和理想主义导致动荡一样诡异的，是文革中对团结和忠诚的苛求带来暴虐泛滥。这又和反智主义共振放大，维持了严重的个人崇拜：理想主义者毛泽东以自己的理想主义实践扼杀了千千万万个本可照亮中国的理想主义者。理想的实现确需合力与约束，但过分强调一致，只能万马齐喑。有行动力的理想主义者必然高估自己的正确性和道德优越性，否则怎能扛过种种艰难险阻？但若无外力限制，助其成功、并为成功所强化的偏执和自以为是，就会引向癫狂乃至毁灭。

个人崇拜在文革中起了双重作用，文革后期神话基本破产，却基本维持了社会稳定并实现权力和平交接，其中个人崇拜所起作用不可小觑。但若无个人崇拜，文革便很难发生。今天颇有青年为文革大民主叫好，却不懂这种反政府不反皇上的民主怎样剥夺人的基本自由。比如文革中很多死刑“判决”乃由“革命群众”现场表决达成，貌似民主，实则几乎每个革命群众都害怕自己因表现不坚决而获罪，往往昧着良心对可怜的犯人做有罪宣判。一旦忠诚成为必须，不忠诚的指控就会成为可资利用的阴险工具，用来塑造一个残暴横行却无处申诉的社会。在现代社会，除家庭与国族尚值得提倡忠诚，没有任何合理逻辑可以让普通人对任何其他人或组织保持无条件绝对忠诚，因为这实在意味着奴役；现代中国人对此等忠诚要求的正当性缺乏警惕和质疑，绝非文革中独有的状况。

文革中的群众性暴力触目惊心。对特定人群的仇恨正当化，是“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在今日中国阴魂不散。对仇恨的塑造和利用虽在战争年代具有一定合理性，然而一旦当权者发现仇恨可用于驯服和重塑社会，基于阶级、民族乃至思想意识区分的歧视和仇恨就变得正当甚至崇高，成为社会文化和教育的要素。别无二致的国人，只因历史上无涉道德的道路选择甚至言论的差异，就成了人民公敌；而对他们的仇恨，居然就等同于对祖国、对人民、对红太阳的热爱。这种被培养的仇恨无时无刻不在侵蚀着社会凝聚力和建设力，拥有权势的革命者们却毫不介意，甚或心存快感。文革的一部分正面意义，或许就在于这些当权派终于尝到了被仇恨埋葬的滋味，并在雨过天晴后有所反思，虽然并不彻底。

无论代价，文革的目标完全落空。在毛泽东思想和对其个人崇拜的锚定下，文革实现了奇特的专制和民主的暴力结合；中国人过去半世纪里唯一一次广泛的政治参与，由是成为充满压抑与恐怖的记忆。文革之民主，是革命精神照耀下的民主，斗争不停；文革之专制，则成为应对这种破坏性民主之必需，乃至文革的和平终结，可谓旧权威“复辟”，也是专制而非民主之功。毛泽东说事物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文革确实在革命的巅峰实现了反革命。

历史告诉我们，巨大的悲剧事件往往祸福相倚。英国内战让英国走向宪政民主；法国大革命传播了启蒙思想；德法战争实现了德国统一崛起；美国南北战争则拉开了美国工业化序幕。二战对全球过去七十年繁荣的意义，更不必说。跳出亲历者的直观感受，在更大尺度上理解文革，其作为历史转折点的意义不亚于甚或超过抗战和中共建国。文革彻底打断了中国社会追求激进正义的革命道路，让之前割裂的革命、非革命和反革命不同群体的中国人，在共同受害后重新凝聚，在新秩序下并肩建设。类似二战之于西方，文革促成了中国价值观和伦理观转向，其后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契约精神、权利意识勃兴，待文革青年成为社会中流砥柱时，成为中国社会的事实主流价值观。现代化的中国脱胎于文革，是文革涅槃迎来了改革开放的阳光。然而，再向前展望，文革是如美国南北战争成为长时段和平与繁荣的起点，还是如德法战争或一战成为数十年后更大灾祸之伏笔？这个问题关乎国运，关乎我辈乃至后辈的人生。

文革期间，十亿中国人依然生活，哪怕伴着苦难，伴着罪恶，伴着绝望。十年，十亿种经历，十亿个视角。政治漩涡背后，依然有鲜活多元的思想与生活形态。且不论当年高度分化的造反派中产生的多态社会思想；在政治并不能覆盖的领域，从知青的知识和艺术探索，到农民的劳动娱乐，以及科研领域出现的突破，中国人依然在创造奇迹；从王朔等人塑造的1990年代语言文化到近年蜚声世界的科幻小说《三体》和屠呦呦、袁隆平的划时代科研成果，其文革背景，折射出来的是一个引人入胜又极易遗失的高维历史空间。当我近年在网上看到文革时代彩色照片时，最感震撼的不是凶神恶煞的小将和失去尊严的被批斗者，不是串联与接见红卫兵的人山人海，而是照片里灿烂的阳光和碧蓝的天空，仿若昨天。

我由于父母家庭背景迥异，自幼便接触到两种文革观。母亲家是地主阶级文化人，姥爷兄妹都是解放前大学生，文革中作为“臭老九”低声下气；老人都是怀念周总理，对毛主席甚少提及；母亲因此文革无缘各种活动，只能埋头读书，1977年考入北师大。父亲则生长在湖北长江边渔村贫农家庭，爷爷奶奶至今节庆还念叨“托毛主席的福”，毛主席像高悬堂屋。父亲文革期间高中毕业回乡务农，扁担上刻字“扎根农村”，旋即“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在生产队卖力苦干，业余时间村里做电工，在夜校教书帮乡亲扫盲，更是三年寒冬都在长江大堤修水利，期间创下了他的喝白酒记录；1976年，父亲被乡亲公平举荐入大学，成了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简直是激情燃烧的岁月。父亲所谈文革年代负面情况不多：武汉武斗吓人，文革初期斗地主不人道，文革后期使用农药不懂防护，伤了肝脏。父亲认为刘少奇不值得同情，对周恩来颇有非议。很多年里，我认为父亲被愚昧的乡亲洗脑了。亏得网络世界的发展，和北京小书摊上盗版港版书生意的一度兴旺，让我关于文革的阅读得以大大扩展，我才得以认识到文革和文革时代的中国何其复杂，无论北京“臭老九”们还是湖北乡民，他们的文革认知都既应被尊重又难免局限。趁着数亿文革亲历者尚在世，现在最需要的不是给文革下定论，而是尽可能让万花筒般的文革记忆与视角得到记录。

洋务运动以降，到甲午战争，到五四运动和北伐，到毛泽东时代到来，到文革结束改革开始，再到近年，中国显现出大致每三十年国运一巨变的历史周期。而这节奏也造成了过去百年中无数中国家庭代际割裂：每代人的选择都被下一代集体弃如敝屣；过去百年来中国人的一次次集体性激进盲动，乃至现在还在豆瓣网上人气旺盛的“父母皆祸害”小组等现象，恐怕都与这种对自己血脉的痛苦否定不无关系。横亘在我们和父辈各自青春间的文革，本已造成父母辈许多人的情感与人格创伤，并和社会层面的文革创伤共振，影响我们的成长；而1978年前后两个都难言正常的社会，更让我们和父母辈往往三观不合，沟通难深入，遑论智慧的分享。但是，化解问题的最佳途径还是理解，而非否认或遗忘。认知我们中间最艰难的那段历史，有助于打开我们之间的心结；如是，我辈或可遏制代沟，促成通达，让长辈的人生体悟得以传承，终止百年来的中国人代际历史性排异，让中国社会变得开阔从容。放眼未来，人类社会变化可能性不可胜数；和长辈通过理解实现沟通的经验，或许在我辈成为未来青年的父辈祖辈时，将会凸显其独特价值。

初到美国读书时，美国人对十九世纪南北战争这历史事件的重视令我吃惊；后来了解到其乃美国崛起之起点，却从不知中国十九世纪有何事可相提并论。回国后，偶然听友人谈及上海的兴起缘自太平天国之乱对江南都市的破坏；出于好奇查书，我才发现太平天国之乱对中国现代社会形成的影响之深怕不亚于美国南北战争，不但人口、方言的分布因此乱大有变动，新生军事和经济力量，从湘军和淮军到晚清新式军人及至民国军阀和革命力量，其形成都可溯源至此。可是，太平天国以往在我的印象里只在中学历史课上稍有提及，味同嚼蜡。我以为太平天国史长期未受重视，问了研究历史的朋友，才知道这竟是建国后历史研究“五朵金花”之一：一个精神病人创立邪教造成上亿伤亡的空前惨剧，居然被吹捧成了伟大的农民起义；而太平天国被洗白，居然和中国革命浪潮同步，为国共两党出于功利目的所包装；而对其全面吹捧，就发生在文革。更触目惊心的是，文革中许多荒唐、反人性的规定与行为，在太平天国中就发生过；只是往昔悲剧完全被粉饰，最需记住的教训被回避和遗忘，而造成灾难的非理性、反人性精神反被赞颂，悲剧重演。待到新的悲剧收场，对这个被极度歪曲的故事失去兴趣的研究者和大众干脆忽略了它。岂不哀哉！

文革和太平天国相隔百年，都是孕育了新时代的悲剧。现在文革又已过去半世纪，在留待我辈塑造的之后岁月中，文革会成为另一个被歪曲或粉饰的时代、然后被视为乏味或无足轻重的往事被简单遗忘吗？随着代际更替，大众记忆势必退化与升华为学者的理论知识和大众的简单常识；而我辈对于将文革记忆传递给后代人，待其从中汲取更多智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今天我辈需要认知、记录和思考这段我们人生的“史前史”，不为复仇或翻案，

而是为了知晓今日中国怎样走来，更是为了能日后更好回答那个文革中无数青年在彷徨、困惑与绝望中，在喧嚣、骚动、屈辱和孤寂的场合下，思考过的问题：中国向何处去？

（作者介绍：封楚宁，北京人，1984年生，毕业于北京四中、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和美国密苏里大学，现从事公益行业。）

□ 原载香港《明报月刊》2017年第3期

~~~~~

## 【人物春秋】

八月二十四，老舍的最后一天如此漫长

• 李 辉 •

1，太平湖，老北京，何处寻？

又一次来到老舍殉难的太平湖。

这是夏夜。我伫立在北京新街口外大街西侧的护城河旁，凝望对岸的“太平湖”。我许多次路过这里，但还从来没有像这样静静地伫立过。我凝望着对岸，品味着喧闹中的清静。当然，我更会遥想起当年发生在对岸的那个永远无法挽回无法弥补的悲剧。

说是太平湖，其实作为“湖”它早已不存在，甚至这个地名在这里也已消失。大概在七十年代修建地铁时，这个不大的湖被填平，在上面修建大片的厂房，成了地铁车辆的停车场。在文革后，老舍的亲人们曾再次走进“太平湖”，缓步于纵横交错的铁轨之间，追想着当年悲剧发生时的情景。他们根据当年的记忆，找寻老舍殉难的地点。然而，一切都已改观，只能指出大概的方位，而具体地点则是无法确定了。

哪怕出现在面前的太平湖早已面目全非，哪怕岁月的流逝早已改变一切，我也相信，那个老舍钟爱的太平湖，那个成为老舍生命终点的太平湖，还是会以当年的模样深深地留在他们的心中。

我们这代人只能从老北京的回忆中感受太平湖。

太平湖民国时期的名称是“苇塘”。

在老北京的记忆里，和京城别的那些著名的湖水景观相比，太平湖自有它的迷人之处。它颇有野趣。荷花在水面迎风摇曳，水边长满芦苇，时而有野鸭或者叫不上名字的水鸟从苇丛中飞起，把静坐在柳树下的垂钓者吓一大跳。湖东岸与新街口外大街马路之间，有一片空地，湖边种了许多花草树木。矮矮的松墙成为一条界线，界线以西便成为太平湖公园。临街的松墙有一个缺口，或者称为公园的入口，但不收门票，人们可以随时进去散步、闲坐、垂钓。因为它在大马路边上，南来北往的行人，走累了，也爱到里边去歇歇脚，聊聊天，坐在沿湖的木条椅子上望望西山。所以专程到这里来逛公园的不多，顺便歇歇脚的不少。湖的南岸是护城河，河水一年四季都是那样慢悠悠地从西往东流淌，静静的，没有一点声响。湖西岸交通不便，没有多少住家，满目荒芜，但更显其幽静。

这便是老舍当年钟爱的太平湖。当他最后一次来到这里后就再也没有离开它。他永远与这个湖相随。不管它存在着还是已然消失。

老舍因太平湖而结束他的生命，太平湖因老舍而久留在人们记忆中。我不知道，假如没有老舍的悲剧发生，人们是否还会想到这个业已消失的太平湖？

消失的不仅仅是太平湖，还有曾经巍峨壮观的城墙。

对于老舍，北京城墙可能显得更为重要。

对于老舍，北京城墙可能显得更为重要，尤其是北京城西北角德胜门一带的城墙，维系着他的一生。这一块小小的天地，是他的人生的起点，也是他的人生终点。他对北京的全部情感，他的艺术想象力，因这一小块天地而得以形成。不难想象，没有城墙衬托的太平湖，会带给老舍多少失望与惆怅。

在老舍最后一次默默地坐在太平湖边的时候，德胜门一带的城墙还没有拆除。从湖边朝南看去，可以看见城墙高高地耸立着，护城河依偎着它，更显其平静与温顺。老舍熟悉城墙内外的一切。城墙那边是他笔下一个个人物活动的天地：祥子拉车穿行的胡同，“四世同堂”的四合院，还有那大大小小的茶馆……

不管旅居到世界什么地方，真正在老舍心中占据首要位置的从来就是北京，他的所有创作中，最为成功的自然也是以老北京为背景的作品。早在四十年代他便这样描述过他与北京难舍难分的依恋：“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儿茶的吆喝的声音，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像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胆的描画它。它是条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条活泼泼的鱼儿来。”

可是，没有了城墙，没有了原有的人情世故，老舍还会一如既往地留恋北京吗？

这一带的城墙先后被拆除是在七十年代修建地铁和二环路的时候。老舍没有亲眼看到城墙的拆除，这样，他的最后一次凝望，便具备特殊的历史告别意味。也许可以这么说，当他头一天受到众多红卫兵的毒打之后，当他把最后一瞥目光落在城墙上之后，他所熟悉的、所眷恋的那个可爱的北京就不复存在了。

老舍是不幸的，他过早地结束了生命。然而，从某一角度来说，他又是幸运的，因为他不再会受到风暴的席卷，不再会亲眼看到浩劫中的古都，如何一日日变得疯狂，变得让人痛心。他不会料到，在随后的一些日子里，老北京曾经有过的令人温馨令人留恋的东西，将或多或少地被此起彼伏的斗争渐渐消蚀。他所珍爱的正直、善良、礼性、侠义等等，似乎一夜之间在人们心目中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些被扭曲的、粗糙的情感和举止。

太平湖、城墙，其实都不妨看作为一种象征。它们的消失，意味着老舍所熟悉的传统意义上的北京完全成为过去，文革风雨席卷过改变过的北京，将是一个外表和内在都使老舍感到陌生的北京。假如老舍得知人们不得不从“您好，谢谢、对不起”的训练中开始文明的起步时，一定会感到惊奇和困惑。他不会知道也不会明白，十年中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人们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人们的道德、古都的文化，怎么会变得如此支离破碎？

2，老舍怎么成了革命的冲击对象

老舍绝对不可能预料到自己居然会成为一场革命的冲击对象，并承受从未经历过的屈辱与痛苦。

他被公认为新时代的“创作标兵”，他的笔为一个崭新的时代而挥舞。一个如此出色地活跃在文坛的作家，应该说最有资格避免悲剧的降临。

老舍在从美国归来不久，就率先成功创作出反映北京新变化歌颂新时代的话剧《龙须沟》，因而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他响应罗瑞卿的号召，根据真人真事创作了配合肃反的讽刺喜剧《西望长安》；他在大跃进的鼓舞下，创作出《全家福》和《女店员》……还有诸多的急就章。短文也好，快板也好，诗歌也好，都是他手中随时可以派上用场的工具。他积极地配合着大大小小的节日或者会议、活动，从而，在不少报刊的编辑看来，他是有求必应的好作者。还没有别的作家能够像他那样活跃，像他那样热情持久。

有的作家还记得，好多年里，每当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前举行庆祝游行时，总有两三个人作为领队，兴奋地走在文艺界的万人方阵前列。他们中间一直有老舍。在那些日子里，他无疑是一个典范，一面旗帜，他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文人，能够成功地行进在新时代的大军之中。

从不愿意修改已经发表的作品的老舍，后来亲自动手修改起《骆驼祥子》了。

在一九五五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骆驼祥子》上，旧版中的第二十三章后半部分与第二十四章的全部，都被删去。在这一章半里，老舍本来是集中写祥子的堕落，删去了这一章半，实际上改变了祥子的结局。而且，他当年说结尾过于匆忙，本应再多写几段，但这次修改，不仅改变了自己所说的从不愿意修改作品的习惯，而且不是增加篇幅使其更加完整，反而是将最后一章半删除。

纯粹文学创作意义上的那个自由自在的老舍改变了。总是将生活中的人与事放在首位的老舍也改变了。

那个自由自在的老舍改变了。

老舍真诚地愿意走在时代的前列。

不过，老北京才是老舍真正的文学之根，创作之魂。

是根，是魂，它才可以像一条从没有枯竭的泉水，默默地在老舍的心底流动着，为他激发灵感，为他输送着语言的鲜活和形象的生动，使他在一日日的急就和应酬的情形下，仍然没有失去文学的活力。这便是老舍的可爱和可贵之处。或者说，是他生存状态的另一面，最终决定了他在逐渐改变自己的时候，仍然能够写出《茶馆》和《正红旗下》这样一些堪称《骆驼祥子》后又一个艺术高峰的作品。

可以想见，当老舍脑子里活跃着自童年起就熟悉的老北京的形形色色人物时，他便真正进入了自由自在得心应手的艺术境界。仿佛一切都早已活在他的心中，声音、味道、画面，都无须苦苦搜寻，便涌到了笔端。在这样的状态下，他的《茶馆》，才能成为世纪的风俗画与艺术瑰宝。其实，即便在创作《龙须沟》这样一些剧作时，对老北京的人与事描写，依然是作品中最为闪光的地方。



文学从来就是这样，只有自己真正熟悉的东西，只有自己放进了全部情感的东西，你才能出色地描绘出来。外在的东西也许一时热闹非凡，甚至能够赢得远比应该得到的多得多的喝彩和荣耀。但如果没有深深的根，没有魂，它最终只能是过眼烟云，甚至仅仅因为曾经昙花一现才引起人们的注意，才不时被人提及。

老舍当年为黄永玉创作的齐白石木刻肖像题字。“文革”后，黄永玉回赠老舍夫人胡洁青并题词，可谓一段佳话。

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似乎矛盾的两面，居然能够并存于老舍一个人身上。许多他的同时代作家，譬如茅盾、巴金、曹禺、沈从文、田汉等人，如果表示出与旧我告别，就尽可能地将以往的影子全然抹去，然后，以崭新的姿态开始走进新的陌生的生活，并尽量去适应它，反映它。老舍有些出人意料。他既能毫不逊色地配合政策，涉足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做一名创作标兵，又能不时沉浸在过去生活的影子中，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从中挖掘出艺术瑰宝。

这大概便是老舍的天赋，或者说是老北京文化的熏陶下，他的性格具有了调和一切保持平衡的能力。我们看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形下，社会与个人，政治与艺术，热情与冷静，不管那一方面，在他那里都不会是脱缰的野马。他仿佛是一位出色的导演，能够让每一个角色在最适合自己的时候出场，表演，退场。

别的人无法拥有他这种能力。

他成功地完成了一种调和，一种平衡。于调和与平衡中保持了文学生命的延续。

### 3，善良，正直，常在心中

几年前，在写一本关于沈从文和丁玲的书时，我读到丁玲对老舍的一段回忆。一个文人的正直和善良，从此开始令我景仰，令我难以忘怀。

在1960年召开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时，丁玲已经身处逆境在北大荒接受劳动改造。不过，仍是中国作协理事的她，还是荣幸地被邀请到京与会。离开文坛仅仅几年，可对她说来，却仿佛有隔世之感。昔日的荣耀不再重现。她出现在会场上，多么希望和久别的同行们握手、拥抱，然而，她被冷落在一旁。人们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她的出现。她有些失望和沮丧。正在这时，老舍走到她的面前，与她握手，问上一句：“怎么样？还好吧？”

并非过多的问候，只是简单一句寒暄，却令丁玲终身难忘。她得到一种被理解被关心的满足。因为她深知，这在当时称得上一次难能可贵的举动。这需要正直、善良和宽厚，也需要一种勇气。

人其实不需要过多的表白，在世态炎凉的时候，一个类似于老舍这种与众不同的举动，便能将人的善良凸现出来。正因为如此，对他我总是怀着钦佩和敬意。

一次到广州看望黄秋耘先生，主要是和他谈周扬。但谈话中，他也以充满敬意的口吻谈到了老舍。就在1960年召开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之前，黄秋耘帮老舍起草一份报告。一天，老舍去逛隆福寺的旧书摊，很高兴地拿着一幅画回来。黄秋耘记得这是一个老画家送给吴祖光的一幅泼墨山水画。当时吴祖光已经到北大荒劳动改造。老舍说：“这可是祖光心爱之物啊！他下去以后，家里恐怕有点绳床瓦灶的景况了。不然，不会把人家送的画拿出来变卖。将来要是祖光能活着回来，我把这画还他，该多好！”

黄秋耘的印象中，当时老舍的眼眶微微发红，但他又突然止住话头，沉默了。黄秋耘看出了他的顾虑，就说：“请您放心，在您家里看到的，听到的，我都不会对人透一星半点儿。”于是，老舍才恢复了平日的幽默：“对，对！这不足为外人道也！”时间久远，许多事情黄秋耘已经不再想起，但老舍的这一侠义之举牢牢地印在他的记忆中。

黄秋耘回忆的这件事，后来从吴祖光先生那里得到了证实。老舍购买回来的这幅画，是齐白石老人送给他和新凤霞的。一次吴祖光从北大荒回到北京，在王府井大街偶然遇到老舍，老舍便热情地将他带到家里，把画还给他，并说要不是经济条件有限，他本应将他们所有散失的字画都买回来。可以想见，备受冷落的吴祖光此时此刻的心情。对于他，这当然是终身难忘的一幕。

在知道老舍这样一些事情之后，我开始明白，老舍为何在同时代文人中间具有感召力，令人们永远怀念他。他虽不是叱咤风云的英雄，但他所表现出来的一个老北京人的细致、周到、善良和正直，却能给予朋友以温暖和信赖，而这，在风云变幻的岁月里则是最为珍贵的。

这便是老舍。一方面，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没有落后过，他的身份，总是免不了积极表态，甚至发表符合要求的批判文章，即便被批判者可能是他曾经深知的友人，他也没有别的选择。可是，表面上的批判，并不代表他的内心。于是，另一方面，在不同场合他又表现出他的与众不同。他依然保持一种友善，在可能的情况下，他还会伸出援助的手。

在这样的时候，政治让位于人情世故，让位于根深蒂固的做人的原则。

老舍还是老舍，没有失去本色，没有割断传统的根。

#### 4，孔庙里的红色风暴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在北京文庙的遭遇，应该说是老舍一生中感觉最突然最不可思议最难以承受的。他的性格，他的处世哲学，乃至他的信念，突然间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验与摧毁。

在一群红卫兵的押解下，他和二十多位作家艺术家，被拉到国子监街文庙大院里，让他们在大成门前的空地上，时而下跪，时而围着燃烧的戏装和书堆跳“牛鬼蛇神舞”。

这是文庙，曾经被读书人视为神圣的殿堂；这是北京，是老舍全身心热爱的地方；这是二十世纪，被公认是现代文明发展的新世纪。可是，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在这样的地点，老舍被挂上黑牌，受到生平第一次的侮辱、毒打。他流血了，伴随着血滴和汗珠的是书籍焚烧飘飞的灰烬。他平生描绘过多少生活场景，可他似乎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更无从预料自己竟然成为这个场面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

他的确没有意想到会是这样一个局面。头一天他接到开会通知便从医院回到家中。他本来可以托辞留在医院，但正在风起云涌的运动，使他无法安稳地留在病房里。多年的惯性驱动下，他不能忘却作为北京市文联领导人的责任，历次运动中从来没有落后过的他，这一次同样不能被认为消极、淡漠。他回到家中，早上穿得整整齐齐，拿上准备好的发言稿，如同以往去主持会议一样走出家门。

老舍是一位对新时代怀着满腔热诚的作家，一位总是愿意将自己融入现实生活的人。多年的忠诚，多年的热情，已经使他能够在一次次出现的新情况下保持自我的安稳和平衡。也许仍有独立的见解，也许仍然于内心深处保持着对生活的复杂感受，但这些，并不会影响到他与上面的政策和号召保持一致，因为他相信领袖超过相信自己。

然而，这个世界变了。北京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八月十九日是疯狂的开端。

这些日子里，整个北京已经陷入了狂热之中。仅仅几天前，八月十八日“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红卫兵第一次受到伟大领袖的接见。林彪在大会发表重要讲话，浓浓的火药味顿时充斥整个古都。

北京真正是在一夜之间完全变了。八月十九日是疯狂的开端。“我们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改掉港式衣裙，剃去怪式发样，烧毁黄色书刊和下流照片。牛仔裤可以改成短裤，余下部分可以做补丁。火箭鞋可以削平，改为凉鞋，高跟鞋改为平底鞋。坏书坏照片作废品处理……”这不是讽刺小说的调侃，而是出自这一天出现在北京大街小巷的第一份红卫兵传单《向旧世界宣战》。就在这一天，三十多万红卫兵冲上了街头，开始了他们所认为的“破四旧”的壮举。

老舍所熟悉的一些地方在狂风暴雨中喘息。

挂了七十多年的“全聚德”招牌，被砸得稀烂，换上由红卫兵写好的“北京烤鸭店”的木牌，而挂在店里的山水字画全部被撕毁；“荣宝斋”的牌匾被“门市部”之类的字样盖住，《砸碎“荣宝斋”》的大字报张贴在原来展览艺术珍品的橱窗上；百年字号瑞蚨祥绸布店内所有字画、契约、宫灯、画屏，都被毁坏……

素来温文尔雅、幽默平和而著称的北京话，忽然间也改变了原有的形态。红卫兵小将们开始毫不顾忌地满嘴粗话，“他妈的”、“老子”、“小子”、“狗崽子”等等，在他们看来，仿佛惟有此才能表现他们的革命性，才能标志着与传统文化的决裂。

此刻的北京，当然不再是老舍所热爱的那个北京。同样，此刻的北京，也不再可能接纳老舍。

但是，住在医院里的老舍似乎对这些没有预感，或者说，他没有做好准备来面对即将降临于自己的冲击。当他那天走到会场时，他才发现人们的眼神已经与以往大大不同。当他被挂上了黑牌时，当红卫兵将他和同行们押解到太庙时，当他看到火焰无情地吞噬书籍时，当他受到呵斥和毒打时，他才开始明白，今天真的与过去大不一样了。

何曾经历过这样的场面，何曾受过这样的侮辱。

老舍可以忍受许多别人难以接受的东西，可以真诚地改变自己早年的某些禀性，但人格的侮辱，对于将名声和面子视为生命的这个老北京来说，无论如何也是无法承受的。他似乎温和，似乎苍老，但在邪恶和无知面前，他依然有他做人的傲气在。于是，当下午被接回市文联后又受到红卫兵的鞭打时，他愤然将挂在颈上的黑牌子扔到地上。

在愤然扔掉黑牌之前，老舍在想些什么呢？

在那一时刻，老舍的目光一定充满着困惑与愤慨。

他不理解，他曾经热爱的北京，他曾经为之描绘为之讴歌的北京人，居然会野兽一般向他扑来。这座城市昔日的温文尔雅昔日的彬彬有礼，仿佛刹那间荡然无存。他不理解，人的眼睛里怎么会闪烁着那么多的仇视和凶残？从人性的角度，从传统的角度，都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

在那个炎热的日子里，老舍面对的便是这样一个无法预料也无法躲避的厄运，他对文化的爱，对北京和祖国的爱，他的所有信念和情感，都在烈火中焚烧着。北京和中国，将在很长时间内，不得不吞咽那场风暴中种下的苦果。

一直愿意跟上时代的老舍，最终仍然没有跟上一个特殊的年代。

他被挂上了批斗的黑牌，受到人格的侮辱。难道岁岁年年所作的一切不能证明自己的进步和清白？难道过去获得荣誉、荣耀转眼间就是梦中泡影？当他在红卫兵面前扔掉挂在脖子上的那块黑牌时，他也就把一个个疑问、质问掷到了地上，让它们发出无声然而却又能在天地间久久不会消失的回响。

## 5，最后一天如此漫长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一定是老舍一生中最漫长的一天。

头一天他的愤然反击受到更为严厉的对待。人们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将他送到附近的派出所，尾随而来的红卫兵，又轮番地毒打他到深夜，直到凌晨，才允许家属把他接回家。

他是以何种心情度过那个夜晚的我们已无法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他最初决定走出家门时，是否就确定要到太平湖寻找归宿。一切，一切，都再也无从知道。我们知道的仅仅是，他让家里的人都走了，甚至妻子也被他说服到单位去参加运动。他不愿意家人因为自己而遭受新的打击。在走出家门时，他手里拿着一副手杖，还有一卷亲自抄写的毛泽东那首著名诗词《咏梅》。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老舍为什么选中带这首诗词，在身处那样一种处境时，他会以何种心绪来品味诗词的意境，如今永远是个谜。

就这样，带着昨天留下的累累伤痕，带着昨天承受的人格侮辱和巨大压力，老舍走出了家门。最后一次出门，再也没有回来。

太平湖公园的看门人注意到了这样一个老人的来临。他回忆说这个老人在公园这里一个人坐了一整天，由上午到晚上，整整一天，几乎没有动过。他估计，悲剧是发生在午夜。

静坐湖边，动也不动，石雕一般。

可以相信，当万念俱灰毅然投入湖中之前，老舍的内心，显然会是前所未有的激烈。太多值得回想的往事，太多值得咀嚼的人生体味，但，我猜想，更多的是困惑，是自省。甚至会有对自我的否定，有深深的自责。

这是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革命。所有传统文化的精华，书也好，文人也好，为什么都将成为必须清除的历史垃圾，如同焚烧的书一样化为灰烬？为什么社会的道德规范人的尊严，一夜之间会变得全无价值？为什么人的兽性会成为社会的主导？

更使他痛苦的还是自己。为什么自己曾经所做的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为什么自己如此真诚如此勤奋仍不能避免这样的命运？为什么偌大一个北京，容纳不下他这样一个从无害人之心的普普通通的文人？

我们已不可能描述老舍当时的全部心情。但我宁愿相信，他也在深深地自责，他有许许多多的内疚和懊悔。他会后悔失去了过多的自我；他会后悔在历次运动中，写下过那么多批判同行的文章；他会后悔没有更多地关心陷入逆境的朋友；他会后悔没有写出更多的如同《茶馆》一样的作品。这样的推测并非是我的一厢情愿，而是符合老舍正直、善良的性格本身的逻辑发展。

他最终走出了生的困境。他不愿意再蒙受新的屈辱，也不愿意因为自己而牵连家人。他看不到前景，无法预测未来的发展，在这样的情形下，也许死对于他才是最好的、唯一的选择。老舍，曾经给予过人们多少安慰和温暖，可在他最需要安慰和温暖的时候，却无从获得。

浓重的夜色里，没有人发现老舍做出最后选择。

儿子舒乙第二天看到的是已经告别人间的老舍。他描述说：父亲头朝西，脚朝东，仰天而躺，头挨着青草和小土路。他没有穿外衣制服，脚上是一双千层底的布鞋，没有什么泥土，他的肚子里没有水，经过一整天的日晒，衣服鞋袜早已干了。他没戴眼镜，眼睛是浮肿的。贴身的衣裤已很凌乱，显然受过法医的检验和摆布。他的头上，脖子上，胸口上，手臂上，有已经干固的大块血斑，还有大片大片的青紫色的瘀血。他遍体鳞伤。

老舍把屈辱、困惑、自责、痛苦留给了自己，也把一个悲剧留给了历史，留给了不断关注它解说它的后人。

我在几年前，采访访问北京的一个日本作家代表团。在一个场合，见到了日本著名作家水上勉。最初知道他的名字，是在读巴金那篇《怀念老舍》的文章时。从巴老的文章里我得知在老舍去世之后，水上勉可能是世界上最早发表文章表示怀念的人。

在得知老舍不幸去世的消息后，水上勉在一九六七年写下了散文《蟋蟀罐》（又译《蟋蟀葫芦》）。他记述老舍访问日本时到他家坐客，交谈中他告诉老舍说，他在一个朋友那里看过一只木制的罐子，说是从中国的旧货摊买回来的，是养蟋蟀用的。老舍当即答应他，假如他到中国去，可以带他到旧货商店去找。令他难忘的是，老舍还答应陪他参观六祖慧能大师的东禅寺。他把老舍的许诺看作一个美妙的梦。但这一切，只能成为永远无法实现的梦了。而老舍留给他的深刻印象，因这美梦的破灭，显得尤为珍贵。

见到水上勉的那天，人很多，我没有向他提出过多问题，后来也没有机会深谈。现在想来，我其实应该详细问问他当年听到老舍去世消息后的心情，从他那里了解，日本文化界是

如何看待老舍，如何理解老舍。或者，如果有可能，话题可以更深入一些，他们当时和后来，是如何看待中国的文革的演进，如何看待文革发生的种种今天看来难以置信的事情。

水上勉那次送给我一本他的近作。这是一本长篇小说，我不懂日文，但我喜欢它的装帧，所以，一段时间里，它总是摆放在书架的醒目位置上。为写这篇文章，我重新找到了早已翻译成中文的《蟋蟀罐》，又一次为一位日本作家对老舍的深情怀念而感动。这只是一篇很短的散文，可是字里行间流溢温情、伤感。尽管他与老舍只有一次见面，可他比文革中的中国人更能认识到老舍的价值，他为中国失去一个老舍而惋惜。

“最近，风闻老舍先生已经去世，这简直不能相信，难道我再也见不到老舍先生了吗？”

读这样的字句，我仿佛听到了遥远的地方传来的一个焦虑而急促的声音。声音显得有些苍凉。这种苍凉，一直到今天依然没有散去。

□ 原载《收获》

~~~~~

【拒绝遗忘】

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生的文革回忆录（选载之十一）

• 王复兴 •

（上接 z k 1 7 0 4 b）

第八章 毕业以后

1、插队锻炼与分配工作

毕业前夕，工军宣队、8341要求同学们相互间对每个人进行评比，指出优、缺点。我们班开会时，轮到对我评比，女生虞S. L.（工人家庭出身）、上海男生陈Z. H.（工人家庭出身）对我提意见，说我“缺乏阶级感情”，而他们对自己的评价是“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对此我很恼火，心想临毕业了，“你们还搞‘血统优势’、‘出身歧视’这一套，想压我一头，讲什么天生的‘阶级感情’，想在档案里为自己搞个好评语，真恶心！”但我强压自己没争论，不想在毕业前夕争吵、伤和气，太没意思。班长高发元对此问题（阶级感情之说）有看法，在系领导召集的一、二年级各班班长的汇报会上，讲了本班有人提出同学之间，有人阶级感情深，有人阶级感情缺乏。当即遭到二年级各班班长对此说法的批评，说这种说法没有客观标准，脱离社会实践空谈阶级感情，是唯心的，是形而上学。不能这样评比。第二天开班会，高发元很高兴地传达了汇报会上，大家对阶级感情一说的否定看法。我听了很高兴。

毕业时工军宣队有个政策，同学中也流传着毕业分配“要老婆，不要父母”这个说法，意思是毕业分配地点照顾男女朋友在一起，但不考虑父母居住地。据说这是从部队复员、转业的经验而来。每人要填写个毕业表格，其中有“爱人”一栏，同学中有男、女朋友的，在填写时须把对象是那个系、那个班、，叫什么名写上。当然单方面声明不算数，如两人一致，便会分配到一个地方。我和张敏便一起分到了河北保定地区。同班好友王渊涛，工军宣队原准备让他留校，他是一年级唯一被指定留校的学生。后来王渊涛声明女友是西语系英2

的林玲后，因林玲是华侨，有海外关系，结果王渊涛留校一事告吹。他和林玲都是福建人，被双双分到江西。这是毕业分配中外松内紧的阶级路线。

1970年3月上旬，我们北大69、70两届毕业生，做为文革期间最后一批毕业生，全部毕业离校。我和女友张敏一起被分到河北保定地区定县插队劳动锻炼。定县是电影《青春之歌》林道静下乡的那个地方。今天是我们这批北大毕业生30多人，来此地谱写青春之歌来了。在定县见到管理我们的县委38军军代表。我们这批人被规定劳动锻炼一年，分到不同公社、生产队。我被分到定县以南20里地的二十里铺，张敏分到西市邑村，离我6里地远。我们与社员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五个校友住在一间老贫农的土坯房，五人挤在一个大炕上。每天敲钟下地，只干活，不挣工分，倒也受社员欢迎。头一个月，生产队轮流派伙，到社员家里吃饭，这当然不受欢迎，但社员们仍很热情，相互比着不能比人家招待得差了。一个月后我们自己起伙，5人轮流不出工做饭。我们是领工资插队锻炼，挺美的。毛主席让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于是我想自己可以用晚上时间去串门，走访老贫农，搞搞社会历史调查。有件事记忆尤新，老贫农、党员老耿告诉我，合作化那会儿，人们不愿意入社，干部就打人，打得很凶，打到你同意入社为止。赶情合作化的实际情形，与书本、报纸上的说教竟是如此不一致。再有一件事，一天我和生产队副队长一起耨地，在地头休息时闲聊，副队长突然对我说，“老王呀，我觉得还是刘少奇的政策好。你说呢？”我马上不加思索地对他“再教育”，“可不能那么说，刘少奇搞的是修正主义路线。”在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我时常想起副队长对我说的心理话，那是几亿农民的心声，包产到户符合他们的心意、利益。而我那时，真是书呆子，可笑！

插队锻炼一年后，分配工作。我最初是分到安国县县委宣传科工作，当时正赶上九届二中全会后批判陈伯达。县委机关从上至下都是38军军代表话事，地方干部是陪衬。宣传科的大批来稿主要由我执笔，科长（38军军人）想把我留下来。我也有志在基层文宣机关好好干。但是无奈党不要我。干了三个月，档案一到，不能在县委机关工作。我和妻子张敏被县教育局分配到离县城十几里地远的公社伍仁桥中学当老师。我们二人住在一间四面透风的小房间，屋里有个用门板搭的床、一个课桌、一个长条木凳，地面是和屋外一样的泥土地，屋顶下雨天漏雨。这是我们婚后的第一个家。二、三年后，我们二人先后被调到安国县县城中学的高中任教，生活条件略有改善。

2、《五七一工程纪要》使我思想大解放

1971年9月13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副统帅林彪与叶群、林立果及随行人员乘256号三叉戟飞机，飞出国境线，堕毁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林彪与随行人员全部因机毁而人亡。

我于1971年12月初放寒假回京过春节。一回到家，妹妹丹娜告诉我，她听高干子弟朋友讲，林彪发动兵变，反对毛主席，用坦克包围了北京，失败了，已逃去苏联。听了这真假难辨的消息，我被惊呆了，最初的反应是不相信，心想八成是谣言。春节期间朋友们互相拜年、串门、聊天，听到许多关于“九一三”事件的确实消息。北京许多单位于12月中传达了中央《粉碎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材料（之一），全国开展起批林整风运动。原来真是有其事啊！随之而来的想法不断在脑中徘徊：林是毛的亲密战友，被毛选定为接班人，并在九大写入党章。现在突然成了反毛的反革命。那么就是说，毛看错人了！毛并不是英明伟大、明察秋毫啊！从此毛泽东的神圣权威在头脑中开始粉碎。

1972年2月，放完寒假一回到安国县中学，就开始了批林整风，我在学校听了传达一系列关于“九一三”事件的中央文件，最令我振聋发聩的是中共中央（1972年）4号

文件。其中有《五七一工程纪要》这一反面教材。它是由空军以林立果为首的几个年轻军官所商议并起草，另外几人是于新野、李伟信、周宇驰。他们身在空军，掌握大量信息，视野开阔，毫不迷信。因林立果的关系，该《纪要》的观点应是深受林彪影响。

该《纪要》首先触动我的是，它对红卫兵运动的简要总结，“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这与我的文革经历、内心感受，正相符合。《纪要》对当时的社会现状的无情揭露，让我认同它所说的大实话，例如：“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被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国民经济已经跌到了崩溃的边缘。”我心想，社会现状可不就是这么回事嘛。《纪要》对我触动最深的，是它以大无畏的勇气对毛泽东的声讨，指控毛泽东是“B52”，是“绞肉机”，是“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纪要》所提出的纲领，令我久久深思。它提出：“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建立一个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用民富国强代替他的‘国富’民穷，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得到真正解放。”

在文革那暗夜深沉的年代，《五七一工程纪要》发出了最高亢的反抗呼声，它是尖锐无比的讨毛檄文，它开启了思想解放的潮流。我与我同辈的许多北大校友，谈起《纪要》，都不约而同地认为：它对本人走出文革，解放思想，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迄今为止，尚未看到中共党内有人写出超越《纪要》的批毛文献。至于毛林之争是怎么回事？对林彪应怎样评价？对林立果为首的小舰队应怎样评价？这不是本文本节要研讨的问题，这些问题还有待于更多史料的披露，更多档案的解密，由史家们去评说。本文本节只是就事论事，实话实说，把《五七一工程纪要》对自己本人及许多校友的实实在在的影响说出来，留此存证。

毛泽东过高估计了自己，据说他不听劝告，坚持要把《五七一工程纪要》做为反面教材放入批林的中央文件，结果适得其反，引发了否定文革、否定毛泽东的思想解放潮流。

回顾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路程，由于盲目崇拜领袖毛泽东，上当受骗，干了许多蠢事、错事。如：反陆平，反工作组，捍卫中央文革，炮轰刘、邓司令部，打派仗，视对立派同学为错误路线的对立面。在文革后期至改革开放之初的思想解放的潮流中，自己逐渐从困惑走向了觉醒，告别了文革，开始追求普世价值。

3、父亲与我的谈话令我心惊（略）

4、四五天安门事件与《革命诗抄》

大约在1973年初，放寒假回北京，见到中文系校友索世晖。他是分配到辽宁省盘锦地区，回京过春节。他告诉我，中央左、右两派斗的很厉害，中央开会时，叶帅和张春桥拍桌子大吵……。索世晖说他支持右派，他现在是右派的立场。

1974年1月春节回家，见到了毕业后被“发配”到贵州凯里、回京过春节的校友陈双基，他愤愤地对我说，“现在批林批孔变成批周公，矛头指向周恩来。这些人想干什么？！”不久，我回到保定地区安国县上班、教课，又接到陈双基来信，约我到保定市校友孟关霖家里相聚。陈双基专程从北京到保定与我和孟关霖见面，一见面就对我们俩人讲：“现在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社会封建法西斯主义。咱们应建立秘密小组，反当局。”我当即表示赞同。由于三人居住三地，后来并没开展什么活动，只是保持通信、交流思想。到了文革后期，人心所向，已经转变。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人们普遍注意到毛泽东没有参加追悼会。4月5日清明节，北京爆发了“四五天安门事件”。此前一个月的3月3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革命烈士纪念碑南侧的浮雕下，出现了悼念周恩来的第一个花圈和悼词《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署名“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部分同志”，旁边有一洁白花圈，挽联是“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沉痛悼念您！”工人带头后，每天从早到晚，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一天比一天人多。人们自发地身佩白花，手抬花圈、花环、花篮，老人、孩子、妇女、青年、工人、农民、学生、职工、干部、北京人、外地人，人群络绎不绝，涌入广场。每日有几十万人，高峰时上百万人。时间长达一个月，总计有7、8百万人。天安门广场到处是花圈，到处张贴着挽联、祭文、诗歌。以诗歌悼念周总理并暗讽时政成为广场一大特色，整个广场成了诗的海洋。人们通过悼念周总理，发泄对文革的不满，对江青、张春桥等人的不满，对毛泽东的不满。

我当时身在工作地点河北安国县，每晚用收音机偷听“敌台”美国之音，得知广场上发生了非常事态。而后张敏的妹妹张丽（在北京外语学校上学）来信，详述了广场上更多的情况。当时《参考消息》也公开报导了一些广场实况，其中有一则外电的报导特别引起我的兴趣和注意，报导说在天安门广场的一个华表的基座上，有一个精致的花篮，挽联上署名“北京大学革命教师”。当时已知迟群、谢静宜封闭了北大、清华校门，严禁师生去广场，禁止去天安门悼念周总理，并说明清明节是“鬼节”。因此北大的这一花篮颇为轰动，并引起外电的广泛报导。北大教师是怎样突破迟群的封锁线的呢？不久我回到北京，去北大看望老师魏杞文、丁始琪夫妇。我问起天安门花篮一事，才得知花篮是丁始琪亲自放到华表上的。她当时正在市内医院住院，知道北大有禁令，没人去广场，于是买了个挺好看的花篮，署名“北京大学革命教师”，送去了广场，放到华表上。我是暑假回京时去的北大，大约是7月，四五天安门事件早已被毛泽东、中央政治局定为反革命事件。丁始琪因送花篮一事正被学校8341领导命令在系里（国际政治系）做检查。丁说同事们、师生们对她都很友善，无人为难她，迟群这时整人已整不起来了。

1976年7月放暑假回到北京，发现首都的政治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四人帮”还没倒台，碰到亲人、朋友、校友普遍地对中央对四五事件的定性不当回事。毛的威望与中央的权威一落千丈，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现象。回到家，大哥王复东兴奋地给我描述天安门广场上纪念活动的盛况，并给我背诵了一首被他背的滚瓜烂熟的天安门诗歌：《向总理请示》“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桥还是烧？”该诗体现了北京人的幽默，剑锋直指“江”、“桥”、“摇”即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复东是清华大学机械制造专业65年毕业生，毕业后在铁道部建厂工程局任工程师。

1976年4月4日、5日清明之时，天安门广场上大规模群众非暴力和平抗议活动达到高潮。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按毛泽东的旨意，把广场纪念活动定性为“反革命性质”。5日晚，广场戒严，北京出动1万多民兵、公安和卫戍区部队，以木棒驱散人群（没有开枪）。6日，天安门广场的花圈、祭文、祭诗被扫荡一空。8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天安门广场上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毛泽东把这场声势浩大的“人民的文革”运动镇压了下去。毛泽东的文革到了1976年，爆发了与他完全对立的群众运动。四五天安门运动是一场自发的人民革命运动，全国有上千万人卷入，它的矛头直指四人帮，指向了毛泽东，它要求结束文革，终止浩劫，充分体现了人民的历史主动性，是最经典的“人民的文革”。谁也不能否认：在文革后期这个有上千万人卷入的“四五天安门事件”是一场人民的革命运动。谁也不能说：“四五运动”属于“毛泽东的文革”。同时，对这么大的一个历史事件，你不能说它什么也不是。在文革中发生的这件大事，是典型意义的“人民的文革”！它与“毛泽东的文革”相对立，体现了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

四人帮倒台后，1977年春节我回北京，父亲告诉我，叔叔王安时在中科院的一伙人汇集、印刷了天安门广场的诗歌、祭文，出了油印的小册子《革命诗抄》，地下发行。那时“四五事件”被中央确定为“反革命事件”，尚未平反，但四人帮已倒台，整人高潮已成过去，此广场诗抄在民间广为流传。我听父亲讲后马上去找叔叔，他给了我一本《诗抄》。

《诗抄》有上百首诗词、祭文。我最喜欢的一首是五言绝句：“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英杰，扬眉剑出鞘。”此诗爱憎分明，富战斗性，读来令人振奋。有一篇祭文反映了天安门广场群众革命运动的本质：“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复返了。”此文表达了人民在文革后期的觉醒，表达了人民的述求：打倒现代秦皇，结束封建专制。它呼喊出了当代中国的最强音！

我从叔叔王安时那得知，这本《革命诗抄》是他们科学院自动化所和航天部五院502所合作搞的。由502所魏庆福等人收集人们在广场手抄的诗歌、祭文，也有许多志愿者自动送上手抄件。然后由王安时在自动化所组织许多人刻钢板，油印，钉装，发行。宋克荒（宋仁穷之子）配合发行，专门负责赠送高干。后来该《诗抄》曾在海淀人民印刷厂印刷。当时叔叔王安时在中科院自动所化负责仪器、设备的管理工作，对《诗抄》的编印、发行，给予财务、设备、印刷等方面的后勤支持。他当时是《诗抄》编印、发行小组的核心成员、相当于社长。《诗抄》很受欢迎，赚了钱后，王安石把全部收入上缴财务部门，后来改为铅印，再从财务部门拨款。印刷发行小组得到自动化所领导的默许，没有干涉。《革命诗抄》的题签是由赵朴初先生所书写。《诗抄》曾先后出过三版，每版都会增加新收集到的诗词和祭文。

叔叔告诉我，与他们同一时间，北京第二外语学院的教师童怀周（应是笔名，怀念周恩来之意）印刷、发行了《天安门诗抄》，广为流传，影响很大。王安时曾多次到童怀周家里，相互交流。“四人邦”倒台后，童怀周主编的《天安门诗抄》曾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中科院那本《革命诗抄》未曾正式出版、发行。我于2015年4月与在香港居住的叔叔王安时通电话，询问有关当年中科院出的《诗抄》一事，他告诉我，他至今手中还保存了一本。我想他手中这册《诗抄》，将来在文革博物馆中会成为珍贵文物。

叔叔告诉我，吴鹏等5人在“四五事件”时曾在广场拍摄了许多照片，又经过广为收集，由罗晓韵（邓立群之女）负责拍照、配插图、制版，出了本影集，而后由北京人民出版社于1977年出版、发行了影集《人民的悼念》。

1978年冬，吴鹏等5人在北京中山公园举办了大型摄影展《自然、社会、人》，传达出在文革大灾大难之后，对人的重视，对生命的尊重，展示出强烈的人文信息。当时许多外地人专程坐火车赶到北京看这个摄影展，有些观众观看时热泪盈眶。此展览当时被媒体评为“一声春雷”。吴鹏以前是个小人物，是名铁路搬道叉的工人。此影展之后，吴鹏等5人成为摄影家协会成员。

诗言志。《诗抄》中一首诗云：“莫把百姓当阿斗，群众从来是英雄。”“首都群众何所惧，谁是阿斗再受骗？”四五天安门事件中流传的这些诗表达了人民的心声。各阶层人民已从文革的浩劫中觉醒，争民主，反迫害，要自由，反专制，矛头直指“四人帮”，直指当代秦始皇。毛泽东的文革已蜕变成人民的文革，四五事件成为中国当代史中罕见的大规模公民权力运动。四五运动虽然被镇压了，但它为粉碎四人帮，为结束文革，为迎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做了思想动员和舆论准备。它预示着一个时代（毛的时代）结束了，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

“四五”事件那一年的1976年是个多事之秋。我的北大好友马云龙在75、76年出了事，在河南被逮捕入狱。

马云龙毕业后被分配到河南，插队劳动锻炼二年后，被分配到长葛县城的五七专科学校任教师。1975年1月10日，他因议论毛泽东、江青的错误，被人举报，被公安逮捕，投入大狱，罪名是“攻击毛主席、攻击中央领导的现行反革命。”马云龙于1976年遇到了危机，毛泽东9月9日去世，10月1日法院开庭对马云龙进行最后的审讯，可能会被判处死刑，恰好在最后开庭审讯期间，“四人帮”倒台了，避过了危机。而后拖延到1979年1月19日他才被无罪释放，在狱中被关押了四年。

马云龙的案件当时是河南省四大反革命案件之一，举报信直接送达到纪登奎（时任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由纪登奎批转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处理。而后由河南省、地、县三级公安、宣传部门组成联合专案组对马云龙进行侦察、立案、逮捕、关押。执行逮捕任务的是许昌公安局正局长。马云龙后来被关押在许昌公安看守所。毛泽东1976年9月9日去世。按中共惯例，逢此特大事件，要施重典、镇反，以维护政局稳定。10月1日，许昌中级人民法院对马云龙进行庭审，主审法官为中院第一把手，马云龙知道凶多吉少，决定全力为自己辩护（没有辩护律师）。马云龙做为“现行反革命犯”，起诉书共列出他85条“罪状”，有：“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攻击中央领导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攻击党的计划生育政策”等等，均属以言治罪。庭审马云龙的第一条“罪状”是“攻击毛主席”，针对马的言论“对毛主席也要一分为二。”进行审讯时，马当庭为自己辩护：“毛主席说过：‘世间万世万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法官说：“毛主席英明伟大，没有错误。”马说：“别的不说，把林彪指定为‘接班人’，还写入党章，事实证明是个错误。”就这样，庭审进行了9天，马云龙一条一条为自己辩护，85条“罪状”才审到一半，10月10日庭审突然停了下来。10月6日“四人帮”被抓捕，10月10日消息传到了河南各级政府……马云龙避过了灭顶之灾。

马云龙的遭遇是个典型事例，反映出当年大学的造反派，在文革后期的觉醒。毕业后，我和马云龙曾在1970年夏季在北京聚会，他在我家住了一个礼拜，后来没再见面，直至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才又见面。久别重逢，畅言天地，我们的思想一直是相通的。他后来写了《狱中杂记》，但内地不准出版，2016年年初他把稿件交给了我处理。

第九章 史事拾遗

1、聂、孙在文革后期及文革之后的遭遇

聂元梓在《回忆录》中感叹：文革十年，她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造反二年，接着被“四人帮”、迟群、谢静宜审查、关押了八年。

文革后，她又再遭难八年。从1978年4月被逮捕、关押到1986年假释，这是第二个八年。这两个八年加上中间“四人帮”倒台后而她仍被关押的1976年10月至1978年4月，她被连轴审查、关押了18年。

这18年的遭难，只因1966年下半年她追随毛泽东干的二件事：第一件是1966年5月25日她领头贴了一张大字报，被伟大领袖利用，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第二件是1966年11月13日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到北大向她传达最高指示，让她去上海“串连”“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于是她和孙蓬一等人奉旨去上海炮轰上海市委的资反路

线，为尔后的上海1月夺权风暴提前造了势。这半年的两件事，她因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遭了十八年灾难。

1967年，聂元梓、孙蓬一反极左，反王关戚，这是历史事实，已被大量史料所证实。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在1970年初动员肃清“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讲话中都把王关戚称为“516分子”。但毛泽东东的禁卫军8341进驻北大后，迟群、谢静宜反而把聂、孙打成了“5.16反革命分子”。反王关戚的人成了与王关戚一伙儿的反革命集团。俗话说：这是那儿跟那儿呀？欲加之罪，竟可以随意颠倒黑白。

1972年10月18日，迟群召开北大校党委会，认定聂元梓、孙蓬一是“‘犯了‘五一六’罪行首恶分子。’提出：“不戴帽子，交群众监督。”（注1）

1973年3月1日，迟群、北大校党委决定：“同意给聂元梓、孙蓬一戴上‘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帽子，开除党籍。”（注2）

1974年12月1日，迟群召开校党委扩大会议，决定“聂元梓、孙蓬一属敌我矛盾”，“要开展批斗。（注3）据聂元梓回忆，在迟群、谢静宜于北大掌权的八年时间，她大会、小会被批斗了上百次。迟群、谢静宜非法关押，长期批斗，无情打击，定性聂元梓、孙蓬一为敌我矛盾，这是一大冤案，是典型的践踏人权的事件。

1969年底，聂被押到江西鲤鱼洲北大五七农场劳改，8341的魏银秋斥责聂说“你是臭老九的总后台！”聂在冬天赤着脚在冰碴子泥地里挖泥挑担子，滑倒在地，腰椎错位，至今异常痛疼，无法正常行走。后来照片子，腰部两个椎骨还有三分之一联着。可当时在鲤鱼洲不让聂治疗，聂只好给周总理写信，这样才让她回京治疗。1970年6月聂被押送回北京，被关在38楼一间小屋，窗户钉了一层木板，再糊上一层纸，密不透风，不见阳光，漆黑一片，阴冷潮湿。工军宣队责令聂天天清洁厕所，打扫院子。回到小屋不许走动，只许坐着。在这种条件下，她患上了严重的血管血栓塞病，从锁骨经胸肋到肚子有一尺多长的血管被血栓堵塞。全身都是大大小小的疙瘩，血管曲张。大夫说从来没见过如此严重的血栓塞。我1972年去北大看聂元梓，她告我，她脑血管也有栓塞，挺危险的。迟群千方百计折磨她。有一次在阶梯教室开批斗会，让聂从晚到早再到晚，连续站了十六个小时，进行马拉松式的批斗。不让吃饭，不让喝水。批斗她的工农兵学员一批接一批，车轮战。聂的遭遇远远不如曾被关押的日本战犯、国民党战犯。“九一三”事件后，聂被批判积极追随林彪集团。到了1976年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北大党委又反过来批聂“配合邓小平搞右倾翻案风。”迟群、谢静宜、王连龙派人逼她为此写检讨。（注4）2004年我希望聂元梓，她对我说：“迟群、谢静宜非法关押我八年，整我。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这样往死里整我。难道毛主席不知道吗？这些年才想明白，那时反王关戚实际上反到了最上面，可那时怎么会想得到是这样啊！迟群整我就是“四人帮”的意思，就是最上面他的意思。”赵建文在2015年4月一次北大校友聚会时，告诉我，“1971年我从江西鲤鱼洲回北京，1972年结束对我的审查时，军宣队领导、8341的孙连仲与我谈话，其中问道：‘谁要整聂元梓？’我回答：‘毛主席。’孙说：‘回答正确。’”我想，这位军宣队领导应是想对赵表白，对他审查虽是冤枉了他，但事出有因。因此对赵透了一点“底儿”。聂元梓在《回忆录》（注5）中提到：她曾从监管她的工军宣队那里得知：“我的被监禁被审查是经过毛主席同意的了……”这就是事情的真相。利用之后，再无价值，可弃之如敝履是也。所谓：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卸磨杀驴。对副统帅尚且如此，何论聂、孙。

原校文革组织部负责人、哲学系教师李清昆于1971年在清查“五一六集团”时，也被审查。李清昆告诉我：当时8341副政委、北大第一把手王连龙亲自审问他。王首先对

他念了一篇毛着《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然后对李说：“你李清昆是推一推就过去，拉一拉就可以过来的人。你要好好交待。516，谁发展了你？你发展了谁？现在我们已都搞清楚了，全都掌握了。你老实交待吧！否则抗拒从严！”整个一个咋唬，大忽悠，都清楚了，还审问什么？

1970至1973年的清查“516分子”运动，在全国清查了300多万“516分子”，文革初期的造反派群众普遍被清查、挨整。聂、孙是不会被漏掉的。当时北大两派头头都被打成了“516”，牛辉林甚至在群众大会上坦白交待自己“是516分子”（其实他根本不是！）毛泽东在文革中、后期要恢复、重建党国体制，因此要肃清反体制的社会意识，对文革初期的造反派来了个大规模的“秋后算账”。但北大聂、孙被打成“516”还有北大的特殊性一面，即聂、孙曾反过王关戚，反极左，实际上是反到了江青头上，毛不高兴，因此被整的尤为厉害。

文革刚开始时，北大中文系三年级学生郭从军，家庭出身工人，被调到《红旗》杂志担任通讯员，实为中央文革的调查员。1967年春夏之交，他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打入了钢铁学院的“五一六兵团”当卧底，并参加了夏天在外语学院的“516兵团”成立大会。查清楚了以张建旗为首的这个“五一六兵团”只有几十个人，并非全国性的组织。纲领是打倒周恩来。郭从军对此等情况有专门报告，上呈给了中央文革。中共中央对这个“五一六兵团”是怎么回事，一清二楚。但1970年3月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把“516集团”说成是全国性的反革命集团。而后全国各省市都设立了清查机构，全国各地大批群众被关、被捕，被斗，被逼供，被殴打，许多人自杀，许多人家破人亡。这是文革中的特大冤案，至今没有彻底清算、平反。郭从军毕业时回到北大，他把自己到“516”卧底的故事，亲口告诉了同班好友马云龙。马云龙曾就此事写了一篇文章，并把文稿传给了我。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迟群、谢静被抓捕、关押。聂元梓、孙蓬一欣喜若狂，孙蓬一说“党得救了！”认为自己也能得救了。聂元梓觉得自己受迟群、谢静宜迫害，“终于等到了出头之日，可以平反了。”但事与愿违，等待他们的是更大的灾难。

“四人邦”倒台后至1978年，聂元梓继续被关押在迟群关押她的38楼一间小屋，后又转到24楼。

1978年3月22日，邓小平接见方毅、蒋南翔、刘西尧及周林（北大党委书记）时，邓问：北大的运动怎么样？聂元梓现在怎么样？周林答：她要翻案。邓说：她有什么案可翻。聂元梓，你们为什么不批？这个人至少应该开除党籍，调到别处去劳动。她有一张大字报，对文革起了推动作用。（注6）邓核心一槌定音，聂、孙厄运再来。

大约在4月10日，聂元梓从关押她的24楼逃跑，跑到国务院信访局上访，控告北大党委对她“非法关押”。上访之后，聂打电话给北大党委，让学校派车接她返校。北大专案组正慌慌张张满世界找逃犯，接聂电话，立马派车把她抓回学校继续关押。

4月19日，北大全校召开批斗聂元梓、孙蓬一大会，批斗之后，校党委副书记韦明宣布：“经上级党委批准，决定开除聂元梓、孙蓬一的党籍，开除聂元梓、孙蓬一的公职，建议依法惩办。”会后由专政机关逮捕了聂元梓、孙蓬一。（注7）给聂、孙定罪的许多材料，沿用了迟群、谢静宜整他们的专案材料。从此，聂、孙开始了漫长的铁窗生活。

1983年3月16日，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聂元梓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力4年。同一天，蒯大富被判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4年。韩爱晶被判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力3年。

同年7月13日，孙蓬一被北京中院判有期徒刑10年。

1938年加入中共的老共产党人聂元梓及烈士子弟、曾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孙蓬一，在公元1978年，成了共产党的阶下囚。原因是因为他们在文革初期积极追随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积极响应、执行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该《通知》是由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制订，并于1966年5月16日在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同志、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同志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全体举手一致赞成，全票通过的。该《通知》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全党全民都必须深刻领会、坚决执行。文革的爆发由1966年5月16日始。

聂元梓于1986年假释后，出狱，获得自由，但却活不下去。她没有工作，没有工资，没有住房，没有医疗保障。北大拒绝按释放人员的有关规定接收她。她不得不暂住姐姐聂元素家。后来遇到北大学生刘若（即刘淑君）可怜她，帮她找了个六平米小屋栖身。她吃饭靠许多朋友、亲戚接济。孔繁也曾资助过她生活费。她出狱后浑身是病，却没钱治病。得了感冒不吃药，硬挺。她想：“我的目标就是，一定要活下去，要活到把历史事实搞清楚，要澄清历史真相。这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把这段历史说明白，总结教训，教育后人。”（注8）于是她从九十年代初期开始，在北大无线电电子系毕业生刘若（刘淑君）和中文系毕业生刘蓓蓓、《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涂光群等人帮助下，口述、编写回忆录。后来她开始做生意，赚了钱，可是儿子大胖又受骗把钱赔光。她几次给中央写信，反映生活问题。后来民政局借给她在海淀的一套旧单元房。习近平主政后，曾两次给她调高生活救济金，现每月有6000元生活费。请了一个保姆。生活总算安定了下来。她今年95岁，每天上午拄着拐棍散步半个小时至一个小时。

1978孙蓬一被捕后，被关在北京公安的半步桥看守所。蒯大富、韩爱晶、李冬民也被关在此处。1981年1月18日老孙在狱中过50岁生日，收到蒯大富一张纸条：赠诗一首，《七律·贺蓬一五十寿辰》

栉风沐雨五十春，
强项如君有几人。
见义勇为真汉子，
抱打不平赛智深。
一生尽瘁干革命，
而今何罪入牢门？
但愿艰难玉成汝，
越经磨练越精神。

（注：引自许爱晶著：《清华蒯大富》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年版430页。此书的真正作者是韩爱晶、蒯大富两个人。蒯大富于2016年4月29日赠送了我一本此书，并题字：“此书是韩爱晶与我合作写成的。请批评指正。蒯大富”。美国《华夏文摘》的《文化革命博物馆》主持人华新民认为此书对研究文革史十分重要。）

1984年10月，孙蓬一被发配到青海塘格木劳改农场。同时乘一列火车被发配到此劳改农场的还有：蒯大富、韩爱晶、魏京生。孙、蒯、韩、魏被一起发配，发配至同一地点

青海的劳改农场，不知是因为在当局眼中，视他们为同类的思想犯？还是因为把魏京生也视为造反派？（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八十年代末，孙蓬一姐姐把他从青海接回北京。发生“六四”事件后，老孙破口大骂。孙蓬一回到北京后，没工作，没工资，住在外甥家。他对朋友们说“我现在靠老婆养活。”许多朋友资助他，赵建文曾赠送他生活费及100百多斤粮票，还有猪肉、粮食等。在石家庄做生意的经济系毕业生刘冲曾赠送他三万元。郭罗基也曾资助过他。孙蓬一被折磨的患了精神病，曾两次自杀未遂。高云鹏曾陪他到安定医院检查，医生诊断他患了“燥狂抑郁症”。孙蓬一于1996年去世，享年才66岁。当时北大哲学系派了两辆大卡车送人去参加追悼会，许多前“井冈山”的人也去参加了追悼会。王若水得肺癌刚动完手术也去了。郑仲兵去了。聂元梓要去，被人阻止，于是送了花圈。

5、聂元梓的四十本文革日记

关于聂元梓的四十本文革日记，我是于2016年4月初回国探亲时听说的。4月9日我与北大校友刘若及聂元梓儿子大胖（于晓东）会面。听他们两人说：聂元梓有四十本文革日记，原来藏在一个朋友家里，后来被这个朋友上交给了北大党委。现收存于北大党委办公室档案室。当年工军宣队在批聂的全校大会上，批判发言曾引用过她的日记；《人民日报》的批聂文章也曾引用过。在北大批聂的展览会上，曾把聂的日记本拆开展览（展示某段文字）；《北京大学纪事》一书也多处引用过聂的日记，但并没注明出处，聂元梓曾在《纪事》上把引用她日记之处的文字用笔画了出来。这证明确有此聂的四十本文革日记在北大保存。

4月21日，我看望聂元梓，曾询问她关于四十本文革日记一事。下面把我与聂就此事的对话记录，抄录如下：

王（笔者）：你在文革中记了四十本日记，有这回事吧？

聂：是的，三十多本，大概四十本吧。

王：现在你这四十本日记在哪儿呢？

聂：在北大党委手里。

王：你应该要回来，你要过吗？

聂：要了很多次，他们不还给我。可能已经扔了。

王：他们不敢扔，真扔了罪过就大了。你应想办法要回来。这四十本日记如一字不改，原汁原味出版，可比你那本回忆录重要多了，价值高百倍。

聂：那当然！

王：你当年每天记日记吗？详细记吗？

聂：有事就记。认为重要的事就会详细记，多写一点。

王：这四十本日记是你的私人财产，你可以给中央领导写信投诉这件事，让领导帮忙，向北大过问此事。你就说这四十本日记的所有权属于你，你要回来的目的是要赠送给“国家图书馆”。你真的可以赠送给“国图”。你的《回忆录》，任继愈老先生不就让你赠送“国图”，你按他意见赠送了。你的日记也可以同样赠送“国图”呀！这样，研究文革史的人就可以去“国图”查阅。比如我，也可以去“国图”查阅你的文革日记呀。你曾因无住处的问题给中央领导写信，不是给你解决住房了吗？你还可以给这位中央领导写信呀！

聂：这是个好主意、好办法。

王：你让朋友帮你打封信，你签个名，托人送给中央领导。

后记：

1、聂元梓的日记当初是交给经济系教师、聂元梓的深交好友萧灼基保管。据大胖讲：交他保管的东西除四十本日记外，还有个存有4000元的银行存折。聂被捕后，曾从狱中写信给萧，萧回话：“别再找我了。”聂出狱后找萧要日记和存折，萧告她：“上交了。”此后二人再无往来。大胖说，萧灼基后来当了全国政协常委。

2、聂刚出狱时，身无分文，很困难，靠亲人和好友救济度日。北大党委不但四十本日记不还聂，存折也不还。聂向北大党委要自己的存折，不给。

3、聂元梓现在已95岁，能写字，但费力，且没有电脑和打印机。李清昆老师曾让我帮聂元梓打一封信，本人签名后帮她送上去。起码可以避免北大把日记给扔了。但我当时过二天就要回美，没时间办，但一直惦记此事。据说聂本人还没办。现记录如上，留此存证。

注释：

注1：王学珍主编：《北京大学纪事》2008年第二版1972年10月18日条目。注2：王学珍主编：《北京大学纪事》2008年第二版1973年3月日条目。

注3：王学珍主编：《北京大学纪事》2008年第二版1974年12月1日条目。

注4：《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社2005年1月版325至330页。

注5：《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社2005年1月版455页。

注6：王学珍主编：《北京大学纪事》2008年第二版1978年4月10日条目。

注7：王学珍主编：《北京大学纪事》2008年第二版1978年4月19日条目。

注8：《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社2005年1月版455页。

注9：《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社2005年1月版313页。

注10：《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社2005年1月版191页，附录：《王力反思录》下摘要。

注11：《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社2005年1月版278、279页。

□ 原载王复兴：《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回忆录》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